

书评|读城

← (上接7版)

顺宗梁国恭靖公主嫁郑何;宣宗万寿公主嫁郑颢。同时,也益发重视科举功名,如《唐摭言》所说:“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荥阳郑氏顺应了进士科文化上升趋势,家学传统较早完成了由经学到辞赋之学的转型,累代皆有进士科人材,甚至出现了郑虔这样专门教授辞科的广文博士。本书第二章关于各房支系的叙录以及第三章“荥阳郑氏宦历与生活”多有这一内容的说明。现知唐代郑氏科举及第者凡158人,其中进士114人(状元13人),主要集中在郑进思、郑邻、郑珣瑜、郑綯这三个家族(参见许友根《唐代郑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科举论丛》,2018.2)。这在当时世族中是比较突出的,提升这一家族的社会声望,以至其时流行的科举故事也多以郑家子弟为素材。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专章分析了《李娃传》中荥阳公子原型问题,揭示了这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又如,新近出现的郑觐墓志、觐与妻合葬墓志,比较集中反映了郑氏家族文化特征,本书也作了专门论述,指出:一方面如郑觐父以门风标榜:“吾世家能读书为文,保素业,老足矣。焉能求名辈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郑觐由江南到长安求试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还由此连缀出李景让事,“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弟考试失利兄则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说明世家家教之严,又表明世族也极重进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饶有趣味。

四是以荥阳郑氏姻亲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会关系网络。本书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郑

氏与皇室、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关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举、年代、职事官及官品等类别。这应是宋前世族社会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价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发生着影响,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联盟社会。虽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权法令打破这种联盟体,但是,积俗难改,终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断。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世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会的活动空间,每人都可在这种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如书中论及杜甫与郑氏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关系网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约作于天宝元年。其时,杜甫三十岁,既无官职,又无科举功名,何以能为当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首先,这是因为三王子事件后,皇甫妃作为瑶王母,尊位已有下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家与郑家的姻亲关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孙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崔家,生杜甫母亲,一女嫁郑家,生郑宏之母,故杜甫与郑氏子弟有姨表亲关系。之前,他与郑宏之曾合写过一篇《祭外祖母文》:“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宏之等从母昆弟,两家因依。弱岁俱苦,慈颜永违。岂无世亲,不如所爱?岂无舅氏,不知所归?”由文看,郑宏之与杜甫都有早年丧母的经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缘此关系,杜甫与郑家人郑虔、郑潜曜交往颇多。由本书所列《郑氏北祖平简公房世系表》看,郑虔、郑潜曜是堂叔侄关系。潜曜妻是皇甫妃与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杜甫文中说:

“甫忝郑庄之宾客,游宴主之园林。以白头之稽阮,岂独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公子泛爱,壮心未已,不论官阙,游、夏入文学之科;兼叙哀伤,颜、谢有后妃之诛。”虽然自认是无名无位的野老,又说他是郑氏清客。对照《郑氏北祖平简公世系》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发现杜甫与郑氏及皇家之间的关系。

在世家社会观念里,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显然,仅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无法看出这些沾亲带故的姻亲,唯有将地下史料与传世文对照,才可理出这些旁根错节的关系。作者由此表还考证出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原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言:“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未尝旁备矣。”元稹母是郑家女,此郑京兆即郑云逵,为郑虔之侄,与杜甫为同辈,是元稹的外祖父辈人物。可能就是缘于这层关系,元稹才接触到数百首杜诗,了解杜甫,并能为杜作墓志。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铭末写道:“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附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阙而铭其卒葬云。……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歿后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嗣业为祖父迁坟途经荆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当时科场名星元稹作墓志,显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

杜诗,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本书不仅是郑氏家族史的史料补充,还是研究中古社会史的专书,既有全局性历史陈述,展示荥阳郑氏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又能对文献作深度发掘与分析,对一些关节进行了专题研究,有由微知渐、由小视大的史家意识。不仅长于辑录新文献,而且能从新史料中发现了易被忽略的盲点,纠正了传世史料的讹误。因此,无论从资料性、工具性还是从知识性、思想性方面看,本书多有值得称道的内容,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度。

同时,本书又贡献了一个关于唐代世族与文学的研究个案。如杜甫与郑氏多人有交往,从开元天宝到大历初,一直有联系。由杜甫诗文看,他只是与郑宏之有姨表亲关系。郑宏之应是解析杜郑关系的关键人物,应须深考。将书中几表对照即可见出,郑宏之父属弼城家九字辈人(唯此家有九思、九臣、九言、九同、九微带九字的名),后过继到弘简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其终官定州刺史,《太平广记》卷四四九记有他的故事:“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獬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擒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他的仕宦经历已成当时的传说。《全唐文补遗》收有郑宏之撰《拓拔寂墓志》,署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守夏州刺史、上柱国,文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墓主亡时三十岁,郑宏

之称其为兄,郑氏其时年岁也当在此上下。至开天之际,郑宏之约四十岁左右,比杜甫大十余岁。杜甫《壮游》回忆:“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此句应理解他从十四五岁起就出游于东都翰墨文场,其所结交的郑氏表亲,如郑虔、郑审、郑潜曜皆年长于他。这些都是超出五服之外的姨表亲关系,杜甫旅食京华时所指责的“富儿”,主要应是这些人。宏之终官定州刺史,小说言其他由宁州改定州,墓志言其为夏州刺史,应是在他在宁州前的职务。其与杜甫祭外祖母,可能是在退官闲居之时。又,元朝郑太和编《麟溪编·别集下》收有空图撰《荥阳族系记序》,其有曰:“唐之有天下也,仰稽前代族姓之学,下诏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参以天下谱牒,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定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藏之秘阁,副在左户。”足证唐代谱牒学之盛。又有言:“观陇西郑回《族系记》:‘回为定著,桓公至温为上篇,南阳至回为下篇,且旁稽户部侍郎郑元哲《故家考》。’”“回,进士也,宜有以久其传矣。”郑元哲终官“仪王文学”。《旧唐书·玄宗诸子传》云:“仪王璲,玄宗第十二子,开元十三年封为仪王,永泰元年薨。”任仪王文学的郑元哲可能是玄宗时期的人。郑回是其晚辈,是郑宏之侄,由《旧唐书·南诏传》看,郑回天宝中明经,授嵩州西泸县令,嵩州陷,为南诏所虏。成为南诏国六相之一(见张固也《读司空图〈荥阳族系记序〉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4),这些都是新见材料与新的研究成果,本书都未及列入,足见,这里的研究空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充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老西门地区的近现代美术资源

林卓

老西门地区是上海老城厢发祥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不仅有文庙,也有董其昌、徐光启、黄炎培、叶企孙等名宿的活动痕迹。民国时期,老西门地区吸引了一批美术精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画家群体纷纷创办新式美术学校、组织美术团体和策划美术展览会来革新美术。

1912年由刘海粟、乌始光等人所创办的上海美专是中国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校。1915年校舍迁至老西门白云观左近后,在此经历了起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构建了一个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和培养专门美术人才的实验平台,标志了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诞生。上海美专的创办开启了上海私立美术学校兴办的风气。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创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选址

西门黄家阙路;另有周湘在西门外黄阙路所办学的中华美术大学,以及丰子恺创办的立达学园美术科。神州女学、城东女学的图画科,与老西门地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美术学校和机构的兴起,还形成了一个美术教育生态圈,李叔同、吴法鼎、李超士、陈抱一、王济远、王道源、张弦、潘玉良、潘天寿、滕固和傅雷等留洋画家都曾在上海美专任教。

此地艺术家群体主要有留欧、留日两派,他们除了在学校担任教职,还组织各种美术社团,定期进行艺术交流、创作和展览。1915年在诞生的“东方画会”是最早的西画研究团体,虽然仅维持一年多便宣告解散,但拉开了西画团体飞速创建的帷幕。此后相继

出现了以上海美专西画教授为骨干的天马会;吸收了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群的晨光美术会;由江小鹣、王济远等西画家发起,潘玉良、唐蕴玉、陈澄波先后加入的艺苑绘画研究所。艺苑的最大特点是兼以美术教育的社团形式,培养了众多美术青年;对中西艺术的兼顾学习和研究在上海乃至中国艺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老西门地区还孕育了新式美术展览和丰富的活动形式。民国时期画家的展览活动相比传统书画家的私人雅集更加公开,民初美术运动的兴起,“画廊”形制初见端倪。上海美专为促进学生观摩艺术,经常举办作品展览。同类专业性场所还有新华艺专的展览场所。影响较大的展览是1913年上海美

专在静安寺路张园“安地第”举办的师生作业展。其他如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中华美术大学所开展的成绩汇报展也同样具有促进美术创作与教学革新的积极意义。天马会借鉴法国“沙龙”和日本“帝展”,以展览会新形式将西画向公共空间开放,先后共举办9次,贯穿整个1920年代。晨光画会举行公开学术演讲,影响了民国时期的西画运动风气。艺苑绘画研究所举办的两届美术展览会,规模空前盛大。展览的盛行带动了展览场所的遍地开花,其中主要有张园、明复图书馆、宁波同乡会等。《申报》《时报》《良友画报》等大众传媒也常报道展览情况、参展画家及作品,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

老西门地区也是中国近代美术出版业的发源地和聚集区,这时期的出版物多为社团刊物、学校学报,如上海美专学术校刊《美术》、上海专科师

范学校的美术思想阵地《艺术批评》等,刊载美术作品和理论文章。社团刊物更为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艺苑发行的展览专号《艺苑》,共两辑,具有展览画册的功能。另外,还有晨光美术会的《晨光》杂志,中华美育会《美育》等。期刊方面还包括一些非专业美术刊物,如《良友画报》《上海画报》《时代画报》《大众画报》《东方杂志》《文华》等,陆续刊载了近现代上海相关美术机构、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这些刊物发行量颇大,所载美术文献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有效保存,可在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找到相关影印本。专业性画册方面,出版社纷纷与名家合作,如天马会出版部1926年出版《济远水彩画集》,金城工艺社1935年出版《张弦素描一集》《朱记瞻画集》《潘玉良画集》等等,图文并茂在当时颇有“视觉启蒙”作用。